

诗性：海德格尔诗学的内在精神

任 昕

内容提要 海德格尔哲学一直是学界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其诗学思想也备受关注。海德格尔诗学以对存在的追问为核心，并有意避开形而上学传统而另辟蹊径，当人们试图从西方传统的哲学、美学或艺术研究角度入手对其诗学做出阐释时，往往无法对其中一些问题和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事实上，海德格尔诗学中存在着一条贯穿全部的内在线索——诗性。以诗性为关键去理解海德格尔诗学，不仅可以串联起其诗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也可以对其中诸多难以理解的问题做出合理阐释。诗性正是海德格尔诗学的内在精神和真正意义所在。

关键词 海德格尔 诗性 诗学 诗与思 形而上学

作为西方 20 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一直受到学界关注，其思想也一直是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在大约 20 世纪 30 年代，海德格尔曾发生过一次思想转向，对存在的关注开始从时间、历史和世界的视域转向对存在进行多方面的探究，转向以对诗歌、艺术作品的阐释来揭示“存在的真理”，转向对更加具体的西方文化、社会问题进行批判，转向对尼采的诠释以及以接近东方思维的方式表达对“存在的自行发生”（Ereignis）的理解。在其转向期间及其后所发生的诸多思想现象，尤其是他对诗和艺术的特殊关注、对诗的阐释和独特的运思，构成其诗学的主要内容。与其哲学思想一样，海德格尔诗学也成为人们热衷探讨的课题。

通常对海德格尔的研究，大都从哲学路径进入。但是，当人们面对海德格尔诗学时，却发现通常的哲学视角并不足以解释他那奇特的

对诗的阐释以及将诗与存在联系在一起的独特运思。而如果从通常的艺术史、文学史、文学批评等角度来看，他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对凡·高作品的分析等又显得不伦不类。如果我们以传统诗学概念来衡量海德格尔对诗的阐释和其他相关论述，他的诗学似乎又不同于以往的诗学研究。这使得海德格尔的诗学及其转向之后的一些思想变得难以理解。

这种理解的困难首先在于海德格尔思想本身的艰深，这给理解带来先期的难度。其次，海德格尔诗学总是与其对存在的追问联系在一起，是从存在出发的思考，因此对海德格尔诗学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其存在论的本体之上，对艺术作品的解释也必须以对存在的思考为依托。第三，海德格尔有意抛开传统诗学、美学的思路而另辟蹊径，他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尝试使自己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立场和方式，使自己对存在的思考能够直达存在的本源。这种运

思的尝试使得海德格尔诗学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品质。第四,不仅是内容和思维的诗化,海德格尔在行文中所表现出的抒情风格和语言的诗意,以及他对词语的词源学考证和自造词汇等做法,使得他后期许多著述都呈现出充满诗情的非“哲学化”的面貌,常常因此使人不知所云。最后,海德格尔诗学的特殊性还在于,他试图以诗、艺术作品为其哲学作阐释。尽管我们也可以认为,同西方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海德格尔从存在出发去阐释诗歌,仍然不过是从哲学立场阐释诗学问题,但海德格尔阐释诗歌的真正动机是揭示存在以及与存在密切相关的所有本源性问题。

即使现在,在海德格尔诗学研究方兴未艾之时,其中很多内容仍然有待进一步挖掘。之所以一些问题至今仍然暧昧不明,除去上述原因,即除去海德格尔诗学自身的一些特质,我认为,在海德格尔诗学中,还存在着一条隐而不显的线索,这条线索贯穿海德格尔诗学始终,串联起其诗学内容的各个方面,并与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的其他方面相关联,成为海德格尔诗学思想和后期其他思想的一个关键因素,这就是“诗性”。如果仅从哲学角度或传统诗学角度接近海德格尔,对他后期的许多作品,我们可能很难做出更为合理、更为深刻的解释。

从“诗性”入手,比起一般的诗学研究,比起单纯对其诗学内容进行阐释,我认为更抓住了海德格尔诗学思想的关键。也就是说,poetic比poetics更为重要。当然,对诗学思想的研究一定是对其诗学内容的阐释,这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工作;如果没有对诗学内容的阐释,一切相关研究都失去了最基本的材料来源和对思想实质的把握。我认为,在对海德格尔诗学作品进行阐释的背后,应是对“诗性”的寻找和把握。对诗性的寻找和把握,即对poetic的理解,是打开海德格尔诗学思想的一把钥匙。

我们或许可以将“诗性”称为海德格尔诗学的内在精神,内在意义,内在线索。我们或许可以笼统地将其诗学的内容视为一种外在的阐释,一种对“诗性”的具体、外化的呈现,而将“诗性”视为其全部诗学内在的灵魂,是串联起对荷尔德林和里尔克诗歌的阐释、对艺术作品本源的探究、对诗思关系的考察、对诗的语言的独特分析、对“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向往、对科技本质的反省以及对形而上学哲学的批判等后期思想的一条脉络。这条内在脉络可以对海德格尔的诗学转向、他对诗的特殊推崇及其一系列诗学思想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一、思想转向与诗性追寻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在《存在与时间》发表后不久,海德格尔发生了一次思想转向,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十几年之久。他没有继续《存在与时间》的写作,同时,由于纳粹事件的牵连,这一时期,海德格尔除了上课和演讲外,很少发表文章,他的许多在这一时期写成的作品大多是推迟发表的。因此,一段时间内,人们并不知道他的思想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当海德格尔的一系列转向之后的文章或讲座面世时,人们才恍然发现这位《存在与时间》的作者似乎已进入了另外一个领域。

转向之后的海德格尔哲学,充满了一种诗一般的气质:他不仅以哲学教授的身份大量撰文讨论诗、艺术作品、语言,甚至连他的行文方式和语言风格都带有强烈的诗意和抒情气息。我们只要看看他转向之后作品的标题,如《“……人诗意地栖居……”》、《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林中路》、《荷尔德林的大地和天空》,就会明显感觉到这种几乎完全脱离经院哲学规则的诗意。可以说,诗性,成为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成为贯穿其间的主旋律之一。

然而,在海德格尔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在

当时曾令许多人困惑不解。《存在与时间》一经发表即引起哲学界的轰动，人们将海德格尔视为哲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视为现象学理所应当的接班人。然而，海德格尔几乎是没有任何征兆地放弃了《存在与时间》的写作，转而研究起诗歌、绘画、语言问题，而其非哲学化的、诗一般的甚至是谜一般的行文就更加令人迷惑。卡尔·勒维特在他的名著《海德格尔——贫乏时代的思想家》中就曾困惑地说：“常常不能断定，海德格尔到底在思维般地写诗呢，还是在诗意般地思维。”^①

海德格尔对诗歌的兴趣其实并不仅仅始于他将诗引入哲学，甚至他对诗如此迷恋也不仅仅是出于个人趣味。也许对诗的这种特殊兴趣一直伴随着他在哲学之路上的前行，只是这二者的关系最初并不明晰，而是随着海德格尔对存在的不断深入探寻而逐渐敞亮起来。海德格尔对诗的这种特殊推崇与其他哲学家是不同的。西方哲学家历来有对艺术进行评论和研究的传统，但这些哲学家所做的，往往是将艺术研究纳入到自身哲学体系中，作为自身哲学大厦的完美的组成部分，用于辅证学说和完善立论。并且，他们论诗的视角往往立足于哲学，是站在哲学制高点上，从宏观的、形而上的、逻辑体系的角度对艺术进行的高屋建瓴式的评析。诗固然重要，但诗只是神圣的哲学王冠上的一颗珠宝，真正的王者仍然是哲学。诗学固然重要，但诗学只是用来诠释哲学体系的一个注脚、一个佐证，它只是哲学大厦的一部分。这种现象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几经历史辗转，在黑格尔的宏大哲学体系中达到顶峰。不可否认，海德格尔之论诗，同样也出自对存在进行探究的哲学视角，其诗学也同样从属于其哲学体系。不同的也许是海德格尔对诗所秉持的态度。海德格尔对诗的热情似乎超出了哲学家的正业。尽管他也试图以诗来诠释和证明哲学问题，但与其他哲学家不同的是，他不是将诗作为哲学的从属，而是将诗、艺术作

品作为与本源相通、可以显现存在的真理的特殊的存在者。他赋予诗以至高的地位，在诗的面前，哲学必须低下它那一直高昂着的尊贵的头。海德格尔要求“我们其他人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道说”，^②尤其在这个贫乏的时代里，首先要倾听诗人的就是哲学家。海德格尔之所为显然已经超出了一个哲学家对诗关心，也许是过于热衷了，反而不在西方哲学讨论艺术问题的传统范畴之内，倒是与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哲学以及谢林哲学中那些充满灵性和神秘气息的诗化内容有些相似。

另一方面，作为文学或艺术研究，海德格尔所做的并不能得到艺术史家或文艺批评家们的认同。与专业诗歌、绘画或某一艺术门类的研究相比，海德格尔对艺术和诗的阐释显得不伦不类。凡·高研究者指出，海德格尔对凡·高的“农鞋”一画的诠释是错误的，因为海德格尔错将凡·高自己的一双破旧的鞋子当做了农妇的鞋子，因此那段著名的抒情文字^③其实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设定上的。而荷尔德林专家们则认为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诗的阐释并不符合文学史研究的规范。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诗学既不符合传统哲学对诗学的建构或传统美学研究，又不在正统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艺术史研究规范内，这也是导致海德格尔诗学难以为人理解的原因。

海德格尔对诗歌的兴趣并不在对诗进行文学研究。海德格尔诗学所关注的不是作诗法或诗学原理等——那是“纯粹”诗学所关注的问题——而在诗的本性。也就是说，海德格尔阐释诗歌，其真正用意不在诗歌，而在发现和揭示诗的本性，即诗性；并以诗，以这种诗性来发现和揭示他所一直追问的存在问题。海德格尔诗学的精神主旨、其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无法从传统诗学角度或单纯从其诗学著述的文字阐释中去找寻的。这样的寻找常常可能因把握不到本质而无所适从或流于表面的解释。海德格尔诗学所关注的问

题仍然是存在以及人的生存,是我们这个世界以及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本源性问题。或者说,海德格尔诗学所关注的不是作为一般文学、艺术形式的诗歌、绘画,而是诗歌、绘画中所蕴涵的“诗性”精神,不是诗歌作为文学形式的美学特征和所传达的社会意蕴,而是关乎诗的本性的东西,这一本性乃是与天地万物相通、与存在相伴、与世界的本源和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东西。因此,海德格尔诗学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其诗学本身所传达的内容,更在于其中所蕴涵的精神。这个精神就是诗性,就是诗的精神。是诗性而不是诗学阐释,构成了海德格尔诗学的精神主旨,造就了海德格尔诗学本身的特质及其丰富性、复杂性。因此,海德格尔诗学虽然名为“诗学”,其真正的品格却并非传统诗学,而是关于诗的思,关于诗性的思。

二、诗性的维度

如果以诗性来总结海德格尔诗学,可归结为三个重要方面:使存在得以显现的诗性,诗性地栖居以及诗性之思。这三个方面不仅大致涵盖了海德格尔诗学的主体,也最能够体现诗性的特质。

诗性使存在得以显现。海德格尔哲学是从存在本源入手开始运思历程的,对存在的追问构成海德格尔哲学的中心问题。不论转向之前还是之后,存在都是其哲学的核心;同时,存在又是其哲学中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海德格尔终其一生行走在追问存在的道路上,从存在出发,又归于存在本源。

海德格尔哲学在前期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从时间的视域探寻存在(Sein)以及此在(Dasein)在世界中的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最根本的问题是回答“存在是什么”,但是,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却几乎从一开始就错了。这一错误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他说:“这两位哲人所赢得

的东西,以各式各样的偏离和‘润色’一直保持到黑格尔的‘逻辑学’之中。曾经以思的至高努力从现象那里争得的东西(虽说是那么零碎那么初级),早已变得微不足道了。”^④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从对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批判开始,展开对存在的追寻。由于西方哲学将“存在”等同于“存在者”,因此,存在这一根本问题从存在论演变为知识论,我们对存在的知晓是通过对存在者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方式则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基础。西方两千年的哲学传统正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也是存在被长期遮蔽的历史。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存在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此在”(人)的领悟来显现的。此在总是在时间中的存在者,也总是在世界中的存在者,因此此在的生存总是有限的、有死的。也正因为如此,此在才会在畏死的、操劳的、有限的生存中领悟存在的意义。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前期对存在的讨论是与此在的生存结合在一起并在时间和世界的境域中展开的。

思想转向之后,海德格尔对存在从现象学之思转向诗性的阐释,通过对诗歌、绘画的微言大义的解析,通过对艺术作品本质的探讨,通过对语言的本体论追问来探寻存在。

1935年,海德格尔做了一次题为《艺术作品的本源》的演讲,引起热烈反响。这篇演讲后于1950年被编入《林中路》发表。这篇文章可视为海德格尔思想转向的标志。在这篇奇特的文章中,海德格尔通过对凡·高绘画、希腊神殿等艺术作品的独特阐释,提出了艺术作品的本源是对存在真理的显现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将艺术与真理结合起来,他说:“真理以几种根本性的方式发生。真理发生的方式之一就是作品的作品存在。”^⑤他认为,艺术作品的本质不是对美的显示,伟大的艺术作品所传达出的不仅仅是美,它将天地万物包容在内,将此在在天地万物中的生存

境况以一种令人震撼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在瞬间照亮了我们平凡的生活；在这片澄明之光中，存在显现，向我们宣示它的莅临。他说：“这种被嵌入作品之中的闪耀就是美。美乃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⑥这是海德格尔第一次以如此充满诗意的笔触将存在揭示出来，明确提出艺术在显现存在方面的独特力量。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对诗和其他艺术作品的阐释，其用意不在进行美学研究。在海德格尔这里，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存在得以显现的场所，存在藉由艺术作品而向此在显现自身。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那些极具丰富内涵的作品，它将天地万物的宏阔画卷和人生历史的风云变幻收纳其中，并向我们展现出来。伟大的艺术作品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和冲击常常是其他人类文化产品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正是艺术的特殊魅力。我们通常将艺术的这种特殊魅力称为美。但是，在海德格尔这里，美的力量显然不仅止于此。美的特殊性在于对生命和世界的本质的揭示，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对“存在的真理”的显现，这是艺术、诗所具有的独特品性。因此，艺术作品就不是一般的艺术形式或美的形式，诗所蕴涵的品质使之可以与存在的真理相通，为我们照亮存在。海德格尔说：“艺术在其本质中就是一个本源：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亦即真理历史性地生成的突出方式。”^⑦海德格尔对诗歌等艺术作品的阐释，就是为揭示诗的这一神秘特性。这一神秘特性就是诗性。是诗性，而不是简单的诗歌或绘画等艺术形式，使存在澄明、显现，使我们藉由对艺术作品的美的感动而领悟存在的真谛。

诗性是人之生存的理想方式。更进一步，海德格尔提出，诗性的存在是人类生存的本真方式。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他说：“人类

此在在其根基上就是‘诗意的’。”^⑧这种诗意的栖居观集中表达在《“……人诗意地栖居……”》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由此将诗与人类生存联系在一起，将诗意作为人存在在大地上的更高标志。在另一篇题为《筑·居·思》的文章中，海德格尔提出了他后期哲学中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四重整体。这是海德格尔对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的设想：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心中怀着对神明的敬仰，将自身的生存与世间生生不息的万物融合在一起。“四重整体”的生存方式的提出，使诗、诗性成为与人、与人之生存息息相关的东西。这种思路可以看做是海德格尔对此前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人类生存境况所做的描述的一种诗意的、理想的回应。

青年时代的海德格尔即非常喜欢荷尔德林的诗，对家乡、自然、土地充满深情。他最初对存在问题发生兴趣使他不可避免地走上一条探求本源问题的道路；而他的前期现象学准备、对自然和本真生活的出自天性的向往，则使他从一开始在面对问题时，即采取了有别于形而上学经院哲学的运思方式，他也一直在力图避免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思考方式。在《存在与时间》中，尽管他尚未充分展示出对诗的特殊关注和偏好，尽管《存在与时间》仍然是一部带有经院哲学痕迹的著作，其思想体系的谋划仍属于体系哲学的套路，但是，在这部具有意义的著作中，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探寻、对特殊的存在者——人的关注以及他在探寻存在问题上永不停歇的热情，使得他的哲学不可避免地离开经院哲学和实证哲学，而向活生生的人类经验和人的实际生存境况靠拢。对人及人的生存境况的关注、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强调以及对本源问题的探索，使海德格尔哲学从一开始就不会拒绝、排斥诗性。海德格尔对东方哲学的兴趣又为这一切起到了催化作用。东方哲学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融合性思维以及面对人生和世界时的诗性之心、审

美之境,将海德格尔思想中那些潜藏着的诗性引导出来。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里尔克诗歌的阐释,对凡·高绘画和希腊神殿的充满激情的想象,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在追问存在、思考人类际遇和反思形而上学症结之时被自然激发出来的诗性。这种诗性正是海德格尔用以思考、批判并试图超越形而上学的一种思想探索。

诗性是超越形而上学之思。进一步,海德格尔将诗与哲学联系起来,提出了“诗性的思”一说。他将与存在本源最为切近、与“神明”息息相通、与诗相联结的哲学称为“思”,以区别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海德格尔有一句著名的论断: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任务将交给思。思是在最初意义上的、具有真正哲学精神的思想及思想方式,是纯粹、原始的人类思想活动,海德格尔称之为“沉思之思”(das besinnliche Nachdenken),它因为摒除了形而上学思维而使存在得以显现。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思是对哲学及诸学科的超越,是对未来所承担的任务,“它超出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分别之外,它比科学技术更要清醒些”。^⑨

思与诗紧密相连,这是海德格尔诗学中的重要内容。他说:“诗与思(Dichten und Denken),两者相互需要,就其极端情况而言,两者一向以它们的方式处于近邻关系中。”^⑩在海德格尔看来,不是哲学(形而上学哲学),而是诗,成为存在寓居的场所,成为传达存在的使者,成为照亮存在、使存在得以显现的特殊形式。因此海德格尔说,哲学要向诗学习,哲学家们必须“冷静地运思”,在“诗所道说的东西中去经验那未曾说出的东西,这将是而且就是唯一的急迫之事”。^⑪

这里牵引出关于诗性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诗与思的关系问题。其实,诗与思一直以来就是一对既让人迷惑又隐含着思维的本体矛盾的古老关系,这种将哲学与诗联结在一起的提法

也并非海德格尔独创。在西方思想史中,哲学与诗的关联从始至终交织在一起,对哲学与诗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论述也一直延续下来。从柏拉图开始的哲学与诗之争,即引出这样一种开端和方向。但在柏拉图那里,似乎首先表明的是哲学与诗之间的对抗性和等级差别,人们往往更多看到逻各斯与秘索斯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却较少关注这一对古老的关系之间的内在渊源和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西方文化史上,由于哲学长期占据着人类思想王者的地位,诗的身份不过是哲学的奴婢,因此,人们更多看到的是诗对哲学的从属,诗的感性和无涉利害的审美特性总是让位于哲学的强大的理性。

但也有时,诗会突破哲学的权威,显示出高于理性之思的神秘力量,甚至直接与神明和本源性存在相通。康德将审美看做连接认知领域与道德王国的中介,赋予美以高于认识理性的特殊能力。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已经开始意识到诗之于反形而上学理性的特殊性质,意识到诗在哲学天命中的不可或缺的意义。他们给予诗最美的赞颂和最高的褒奖,对他们来说,诗已不是一般的艺术形式,而是人类精神的守护天使,负有传达来自神的旨意的特殊使命。谢林认为整个宇宙本身就是诗。弗·施勒格尔认为,“一切艺术和科学的内在的神秘意蕴乃是诗的财产。一切都是出自这里,一切也必将回归这里。在人性的理想状态中,只有诗存在……”^⑫

海德格尔的诗性之思与他之前的这些带有“诗性取向”的先哲们是一脉相承的。但海德格尔不仅认识到诗的这种特殊性质,还进一步将诗的天命和哲学的天命紧紧联结在一起。他抓住了诗与哲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同时寄予诗以一种通达存在、联结人神并引导哲学走向更始源的思的重任。

三、诗性的救赎意义

寻找诗性,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一个重

要主题。诗性究竟在我们的生存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我们为什么需要诗性？而思想又与诗有着怎样的关系？这样的追问把我们带入对更多问题的思考中。海德格尔对诗的这种特殊推崇是大有深意的。海德格尔论诗之本质的目的并非要从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说明什么是诗，正如他自己在论文集《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增订第四版前言中所说，这些阐释“无意于成为文学史研究论文和美学论文”，“这些阐释乃出自一种思的必然”，^③是“一种思（Denken）与一种诗（Dichten）的对话”。^④

杜夫海纳曾说过：“在人类经历和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可能找出审美经验；它开辟通向科学和行动的途径。原因是：它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在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的这一点上。”^⑤诗与哲学由于均与人生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有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这是诗与哲学相通的基础；而诗所具有的特殊品性即诗性又与西方哲学中以理性和逻辑为主要特征的形而上学大相径庭，这是诗与哲学的差异。那些带有“诗性取向”的先哲们以及海德格尔本人之所以对诗与哲学的关系如此强调，之所以如此推重诗，正是看重了诗在匡正和改变西方哲学理性弊端方面的独特优势。尤其在这个“形而上学猖獗”的年代，海德格尔对诗寄予了更加深切的期望，赋予诗以一种超乎形而上学哲学之上的至高力量。在海德格尔看来，当今西方世界是一个缺乏诗性的时代，因其缺乏诗性，也同时是一个缺乏神性的时代。诸神的缺席意味着“世界时代的夜晚便趋向于黑夜”，^⑥它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黑暗，因为这是一个“逃遁了的诸神和正在到来的神的时代。这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因为它处于一个双重的匮乏和双重的不之中：在已逃遁的诸神之不再和正在到来的神之尚未中”。^⑦从社会发展层面看，海德格尔将它命名为“技术图像”的时代。正因为诗性的匮乏和神的缺席，形而上学和科技理性充斥并

主宰了人类生活，包括人心。形而上学以技术性思维的泛滥和对全球的统治宣告了它发展的顶峰。这个时代，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对立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尖锐，人对自然和生存环境的破坏已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西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凸显。

西方文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海德格尔和许多西方思想家们一直试图回答和解决的。海德格尔认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中主体与客体、心与物、人与世界对立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既成就了西方文明，也导致了西方社会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种种问题。这一切都表明，哲学在其中已不再能胜任思想王者的角色，真正的思想已被两千年的哲学传统所蒙蔽，被当今的“计算性思维”（das rechnende Denken）所取代。哲学本应肩负起开启人类思想真理的职责，却已无法解答当今世界的种种疑难。西方哲学传统就是形而上学哲学的传统，而未来哲学所面临的任务就是“放弃以往的思想，而去规定思的事情”，^⑧即回到真正的思。

这也是海德格尔为何坚持要回到存在本源并以诗性之思去追寻存在本源的原因。形而上学哲学因其本身处于传统之内并囿于其本身固有的缺陷而无法起到让思回归本源、回归存在的功能。而能够克服哲学困境、纠正形而上学思维内在问题的，就是诗，这也是海德格尔何以大谈诗学问题的原因。这是海德格尔为西方世界所开的诊断、所给出的药方。

从哲学与诗之争来看，在一定时代中，哲学与诗谁被推举到王者的宝座，谁扮演着更加权威的角色，其背后显示出这个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脉动。当理性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宰时，诗性便悄然隐匿了，仿佛正如黑格尔所预言：“从这一切方面看，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⑨“我们尽管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日趋于完

善,但是艺术的形式已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了。”^②反之,当人们开始膜拜诗神的光芒,当诗在某一时代大行其道,诗性哲学方兴未艾时,理性的权威便开始受到质疑。诗性的时代总是一个对理性、逻各斯、秩序及至传统、中心、权威进行反思、讨伐的时代。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笼统和绝对,但诗的兴起无疑是一种表征,它宣示着一个怀疑理性、反抗理性的时代的到来。这往往是一个变动和开放的时代,一个结束和开始的时期。由于西方文化中形而上学、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诗的兴起,便往往是对正统形而上学的讨伐,这就使诗性在审美的、无利害的游戏性背后,潜藏着批判和反叛的火药味,潜藏着向理性开火的战斗精神。柏拉图从一开始就击中要害地指出了理性与诗之间的这种差异和对立。在西方文化中,理性的秩序和诗性的灵光一直在暗暗较量,这是自其文化形成以来如影随形的现象。这种较量直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终于爆发为大规模的西方反形而上学潮流。在这一潮流中,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反思、批判的火力从没有来得如此密集、全面、持久、大规模,许多西方思想家、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形而上学和西方文化展开了全面、深刻的清算,曾经被奉为西方文化圭臬的理性、逻各斯、科学精神、启蒙思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动摇、颠覆。在这一潮流中,哲学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诗之登场与哲学命运的变化息息相关,哲学与诗从争斗变为紧密联系、融合在一起,西方哲学开始真正向诗俯首,许多著名的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诗,转向艺术,转向西方哲学之外的文明形态。诗之于哲学,此时似乎更是一种希望。

海德格尔哲学体现出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海德格尔思想发生的背景,正是西方近现代以来文化反思的时代。西方现代哲学在总体上是向着反传统的方向发展的,反思、批判、解构构成了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20世纪

以来哲学的总体倾向和特征。20世纪西方所有重要的哲学家都在试图寻找西方文明问题的答案。海德格尔哲学建立在对旧哲学的全面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这也使海德格尔哲学在20世纪西方哲学史的解构链条中构成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因此,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和超越,也同时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立场、基本倾向。海德格尔的策略是以存在来否定形而上学传统的合法性,思想转向后则以诗学接续对存在的思考,将诗作为对西方形而上学哲学进行批判、对抗、修正、克服和救治的方式。他认为西方人因为浸淫在形而上学理性之中太久,反倒遗忘了真正的思。为此“我们必须学会这种思,虽然我们有思的能力,或甚至是有天生秉赋,但这并没有保证我们能思”。^③而真正的思是与诗相伴而生的。海德格尔之提出诗性的思,所针对的正是形而上学理性之思。这种做法直指形而上学的思维基础。尽管海德格尔并没有明确提出诗性是什么,以及何以诗性可以匡正形而上学理性,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诗性以其圆融性、整体性、审美性、感性、模糊性、无功利性、自由性而恰与形而上学理性所秉持的主客体的分离和对立、理性以及两分性、差异性、离析性、概念性、线性等思维方式形成对比。海德格尔意在通过诗性的思来超越形而上学的思,诚如西方学者大卫·哈里伯顿所指出的:“激发海德格尔诗性的思的动力,以及因此产生的能量,其中有些是来自对唤起事物的整体性的观念的渴望,整体性观念已经被形而上学变为分离与对立的关系。因此,以形而上学标准来衡量,事物最终的原因应该表现为自身的对立。”^④当尼采以一句“上帝死了”来无情摧毁西方核心价值体系、道德准则和信仰权威时,当德里达以“延异”来消解意义、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秩序时,海德格尔的这一解构过程更像是一种超越的努力而不仅仅是摧毁。大卫·哈里伯顿在评价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

判时指出：“破坏传统，一如海德格尔所理解的，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毁灭过去或将过去搁置在一边，与之同样具有破坏力的另一种相近的表达是‘克服形而上学’，这意味着采取一种立场，一种与正在克服的事物无关的立场。这一过程宁可从内部进行……”^②海德格尔一直在寻找“否定形而上学之后思想如何可能”的方法。在指出形而上学根本错误之后，海德格尔试图从西方思想的根部、从思维变换的角度来解决形而上学的本质缺陷。这并不是对形而上学的彻底消灭，这一解构过程一直都伴随着寻找出路的努力，也许称之为批判、反抗、匡正、救治、超越更为合适。颠覆、破坏、消解或解构也同样道出了诗性对形而上学的对抗作用，只是缺少了救赎、建构和人间关怀的意味。

这是海德格尔何以发生诗学的转向，从诗之中寻求思想灵感，提出诗性的思的真正目的，也是其诗学观念的主旨和意义所在。如果我们仅仅把他的诗学作为一般的艺术作品分析来理解，那么我们的研究很可能会流于一般的诗学阐释，我们也有可能把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思考简单地当做一种对进步历史观的反动和对现代文明的悲观指责，或将他的理想主义和人间关怀视为乌托邦或神秘的宗教情绪。海德格尔诗学的意义正在于其中所蕴涵的诗性，这也是诗性何以比诗学更为重要的原因。

注释：

- ① 转引自程志民、杨深：《存在的呼唤》，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92页。
- ②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276页。

- ③ 指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对凡·高的一幅绘画所写的文字。在这幅画中，凡·高描绘了一双破旧的鞋子，经凡·高研究专家考证，这双破旧的鞋子为凡·高本人的物品。但海德格尔在文中错将这双鞋子作为农妇的鞋子，并以此展开对人与大地的关系以及人在大地之上生存的主题的抒情联想。这段文字成为海德格尔讨论艺术作品能够显现“存在的真理”这一后期诗学主题的一段著名的优美文字。
- ④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三联书店1987年版，3页。
- ⑤ 海德格尔：《林中路》，39页。
- ⑥ 海德格尔：《林中路》，40页。
- ⑦ 海德格尔：《林中路》，61-62页。
- ⑧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46页。
- ⑨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87页。
- ⑩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141页。
- ⑪ 海德格尔：《林中路》，278页。
- ⑫ 弗·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李伯杰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197页。
- ⑬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1页。
- ⑭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2页。
- ⑮ 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8页。
- ⑯ 海德格尔：《林中路》，273页。
- ⑰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52-53页。
- ⑱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89页。
- ⑲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132页。
- ⑳ 黑格尔：《美学》第1卷，15页。
- ㉑ 海德格尔：《什么召唤思？》，见《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1218页。
- ㉒ David Halliburton, *Poetic Thinking: An Approach to Heidegg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 19.
- ㉓ David Halliburton, *Poetic Thinking: An Approach to Heidegger*, p. 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何 卫